

抗戰的抗戰

——「中國現代文學」在臺灣（1978-1992）*

張俐璇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提 要

1988年香港三聯書店出版的《端木蕻良》一書，在今天的臺大圖書館，還留有「特種資料／限制閱覽」的貼紙，顯示「中國現代文學」並沒有隨著解嚴解禁。不過八〇年代初期，端木蕻良等東北作家卻又曾先後出現在兩大報副刊，以及《現代文學》「抗戰文學」專號中。本文指出，戒嚴時期臺灣之所以討論東北作家，是對於「中國抗戰文學」研究的抗戰。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抗戰文學研究，在改革開放後有所轉向，從「解放區」來到「淪陷區」，甚至是「國統區」文學，因此繼「三十年代文藝」之後，「抗戰時期文學」成為國、共兩黨再度爭奪詮釋權的議題，「中國現代文學」在臺灣因

* 本文為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臺灣文學場域中『民國文學』視野的變遷（1966-1987）III-II&III-III」（MOST 107-2410-H-002-195-MY2）部分成果，初稿為〈寶刀出鞘：臺灣「抗戰時期文學」生產（1978-1987）〉，2018年9月30日發表於臺大臺文所主辦之「第三屆文化流動與知識傳播：臺灣文學與亞太人文的在地、跨界與混雜」國際學術研討會。本文大幅改寫，受益於研討會講評人游勝冠教授、當時前來訪學的福建師範大學黃育聰老師、本刊匿名審查委員的諸多建議，以及從四川大學轉任政治大學的王婉如老師，在資料查找上的協助，特此致謝。

而有選擇性地接受，並試圖經由「抗日經驗」將「光復前臺灣文學」包括在內。本文由此指出，八〇年代臺灣的文學場域，既有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抗戰文學研究的抗戰，同時也有對中華民國抗戰文學研究的抗戰。

關鍵詞：抗戰文學 中國現代文學 東北作家 光復前臺灣文學 寶刀集

抗戰的抗戰

——「中國現代文學」在臺灣（1978-1992）

張俐璇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一、從「端木蕻良的現身」談起

1967年1月，林海音主編的《純文學》在臺創刊，第2期即推出「近代中國作家與作品」專欄，評介五四以降二、三〇年代作家及作品，編案揭示：「重刊這些作品的目的，是為了彌補現代讀者對近代中國文學作品的脫節現象。」關鍵詞正是「彌補」與「脫節」。在檢查制度的六〇年代，此舉無異「艱難而冒險」，然《純文學》從「彌補脫節」心念出發，自許地山至陳西滢共評介了二十一位作家，構築了一條臺灣1949年後與五四文學關聯的新時間走廊……^①

諸多成名於一九二〇、三〇年代的作家，因為「陷匪」或「附匪」的理由，在戒嚴時期臺灣，名列《查禁圖書目錄》，因此誠如蘇偉貞、王鈺婷、李京珮等前行研究指出，《純文學》月刊自第2期到第25期（1967年2月至1969年1月）的「近代中國作家與作品」專欄，是林海音出於「自由人文主義的關懷」，^②藉由

① 蘇偉貞：〈彌補與脫節：臺、港《純文學》比較——以「近代中國作家與作品」專欄為主〉，《成大中文學報》第60期（2018年3月），頁31。

② 王鈺婷：〈五四女性文學傳統之傳承與轉化——以台、港《純文學》「近代中國作家與作品」專欄為討論範圍〉，《民國文學與文化研究集刊》第3期（2018年6月），頁127。

「兩岸文化灰色地帶」^③的操作，開啓「曲折的縫綴」，^④將「民國八年（一九一九）五四運動以後」^⑤的作品，加以評介，引入戒嚴時期臺灣的文學場域。

一九六〇年代末《純文學》月刊的這些專欄文章，在1980年由純文學出版社結集出版為《中國近代作家與作品》，共收錄從許地山到徐志摩等18位作家49篇作品，以及20篇評介。當時除了「凌淑華和沈從文尚健在，其他都早已作古」。^⑥在《中國近代作家與作品》選集出版前後，洪範書店亦有秦賢次主編的《郁達夫南洋隨筆》（1978）、《梁遇春散文集》（1979）與楊牧主編的《豐子愷文選》（1982）、《周作人文選》（1983）、《許地山小說選》（1984）等中國現代文學的出版。這裡可以留意的是，無論是純文學出版社，抑或是洪範書店，選擇出版的對象，在戒嚴時期臺灣的文學場域都屬於「保險係數大」^⑦的作家。所謂「保險係數大」的「安全名單」大抵有兩義：一是在1949年前已過世的作家，無須面對「共產中國」和「自由中國」的選擇，因此沒有「陷匪」或「附匪」的問題；二是在中國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整肅的對象，例如老舍、豐子愷等，因為他們在「共產中國」遭遇不幸，更能彰顯「自由中國」一直以來的寬容。

不過，1980年在兩大報副刊標題上，卻出現了「端木蕻良」這個新的名字。《聯合報·聯合副刊》在6月15、16日連續刊出〈抗戰時期作家——蕭紅·蕭軍·端木蕻良〉長文；^⑧《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也在6月16日登載夏志清的研

③ 蘇偉貞：〈彌補與脫節：臺、港《純文學》比較——以「近代中國作家與作品」專欄為主〉，頁41。

④ 李京珮：〈曲折的縫綴：《純文學》對五四作家的接受〉，收於封德屏總編輯：《台灣現當代文學媒介研究：2007青年文學會議論文集》（臺北：文訊雜誌社，2008年3月），頁77-100。

⑤ 林海音：〈一點說明〉，《中國近代作家與作品》（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80年），頁1。

⑥ 同前註，頁2。18位作家分為許地山（1894-1941）、郁達夫（1896-1945）、凌淑華（1900-1990，1943旅英）、蘆隱（1899-1934）、戴望舒（1905-1950）、沈從文（1902-1988）、周作人（1885-1967）、老舍（1899-1966）、魯彥（1901-1944）、朱自清（1898-1948）、夏丏尊（1886-1946）、宋春舫（1892-1938）、俞平伯（1900-1990）、羅淑（1903-1938）、朱湘（1904-1933）、孫福熙（1898-1962）、孫伏園（1894-1966）、徐志摩（1897-1931）。

⑦ 古遠清：〈林海音：作為「自由派」的作家〉，《幾度飄零：大陸赴臺文人沉浮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195。

⑧ 文船山：〈抗戰時期作家——蕭紅·蕭軍·端木蕻良：他們的愛情與生活底悲劇〉，《聯合報》第八版，1980年6月15日及16日。

討論論文〈端木蕻良的科爾沁旗草原〉。⁹這兩篇文章，是戒嚴時期臺灣大報副刊以端木蕻良為題的唯一一次。稍晚，1983年《現代文學》復刊第21期推出「抗戰文學」專號，開篇是夏志清的長文，談端木蕻良的生平，並再談端木起筆於1933年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科爾沁旗草原》，高度評價這部小說「在喚起封建時代上流社會的生活方式這點，能夠與《紅樓夢》相比而能如此值得稱讚」。¹⁰

同為「東北作家」，蕭紅與蕭軍並非第一次出現在戒嚴時期臺灣的報紙副刊，1955年當魯迅的「得意門生如蕭軍、馮雪峯、胡風等相繼遭受清算」，聯合副刊便曾報導在香港的左翼文化人，跑到蕭紅墓上大哭一場，遙祭「被共匪清算的冤魂」。¹¹1966年中國文化大革命之初，由於誤以為蕭軍「以英年慘遭橫死」，中央副刊大篇幅報導「魯迅生前愛之若子女的」蕭軍（1907-1988）與蕭紅（1911-1942）其人其文的下場，感嘆這兩位三十年代左翼文壇夫婦作家，如今「血比墨還濃」。¹²

綜上所述，從《純文學》月刊引介的二、三〇年代作家作品，以及中央副刊所報導的蕭軍與蕭紅，都是因為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發生，讓「三十年代文藝」在臺灣重新獲得討論與研究的機會；¹³那麼，又是怎樣的歷史情境，讓還在世的端木蕻良（1912-1996）得以在戒嚴時期臺灣的文學場域現身？並且必須與「抗戰時期」聯繫在一起？

⁹ 原文為兩萬字英文稿，宣讀於在巴黎召開的「中國的抗戰文學」討論會。余雙仁節譯，夏志清：〈端木蕻良的科爾沁旗草原〉，《中國時報》第八版（人間副刊），1980年6月16日。

¹⁰ 杜國清譯、夏志清：〈端木蕻良的「科爾沁旗草原」——作者生平與作品研究〉，《現代文學》復刊第21期（1983年9月），頁41。夏志清認為其他可堪與《紅樓夢》比擬的是姜貴《旋風》、張愛玲《怨女》以及茅盾《霜葉紅似二月花》。

¹¹ 自聯社：〈淺水灣投蕭紅墓上 魯迅弟子遙祭冤魂〉，《聯合報》第六版（聯合副刊），1955年6月25日。此為林海音主編聯合副刊任內。

¹² 玄默：〈蕭軍與蕭紅〉，《中央日報》第六版（中央副刊），1966年11月2日。

¹³ 張俐璇：〈從問題到研究：中國「三十年代文藝」在臺灣（1966-1987）〉，《成大中文學報》第63期（2018年12月），頁182。

二、中國「現代文學」與「抗戰文學」研究

蕭軍和蕭紅在 1966 年出現於臺灣報紙副刊的身分是「三十年代作家」；1980 年再次出現時的定位則是「抗戰時期作家」。如是轉變的時代背景，是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中國現代文學」詮釋的角力。

「中國現代文學」作為一門學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指涉的是 1917-1949 年或 1919-1949 年間的中國新文學作家作品。若以 1917 年為始，係植基於胡適〈文學改良芻議〉以及陳獨秀〈文學革命論〉的發表，以及同年俄國十月革命的發生；若以 1919 年為始，則係以五四運動作為劃界標的。無論何者，「中國現代文學」標誌的是「新民主主義」的階段，有別於此前的「舊民主主義」；通過這個階段，迎來其後 1949 年「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因此，「中國現代文學」作為「共產黨文化勝利史」，¹⁴ 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增設的課程。¹⁵

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一部分，「抗戰時期文學」實際上包含三個組成：國民黨統治的「國統區」、共產黨所領導的以延安為中心的三邊¹⁶「解放區」，以及日本侵華之後在中國境內所佔領的「淪陷區」。¹⁷ 由於新中國的現代文學史敘述，以左翼為尊，因此「抗戰時期文學」多聚焦於「解放區」，批評「國統區」右傾，避而不談「淪陷區」文學，或籠統地斥為漢奸文學與靡靡之音。¹⁸ 這樣的研

¹⁴ 許子東語。鮑國華、杜新艷整理：〈想像中國的方法：王德威、許子東、陳平原對談〉，收於陳平原編：《文學史的書寫與教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 年），頁 170。

¹⁵ 藍海（田仲濟）：〈《中國抗戰文藝史》修訂再版後記〉，《中國抗戰文藝史》（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10 年），頁 162。

¹⁶ 「三邊」為晉（山西東北部）、察（察哈爾西南部）、冀（熱河南部和河北大部分）的鄉村地區。奚密：〈從一九三七年迄今的中國文學〉，收於孫康宜主編：《劍橋中國文學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7 年），頁 569。

¹⁷ 王克文：〈歐美學者對抗戰時期中國淪陷區的研究〉，《歷史研究》第 5 期（2000 年 5 月），頁 170。

¹⁸ 張中良：〈抗戰文學研究的概況與問題〉，《抗戰文學與正面戰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年），頁 224。

究趨勢，到了「新時期」產生轉向。

新時期「歷史」的起點通常溯自 1978 年 12 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¹⁹會議上決議肅清「極左」的路線，採取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政治路線；在文化領域方面，則鼓勵作家和知識分子「解放思想」，²⁰因此在中國的歷史教科書裡，被視為「偉大的轉折」。²¹

新時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轉變之一是「西學東漸」現象：不同於文革期間外國文學翻譯的極度凋零，大量的翻譯「登陸」。²²在這一波翻譯浪潮中，也包含了對海外學術研究成果的翻譯，最具代表性的當屬美籍華裔漢學家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1961）以及美國軍官翻譯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的《蕭紅評傳》（1976），同在 1979 年於香港出版中譯本。²³這些專論促發了中國學術場域對於「現代文學」的重新評價，²⁴特別是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1945-1976），幾乎不談的「抗日戰爭時期的淪陷區文學」，²⁵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卻以三個專章分論同在上海淪陷區的張愛玲（1920-1995）、錢鍾書（1910-1998）與師陀（1910-1988），而葛浩文的《蕭紅評傳》則突顯了「東北作家」的特殊性。

中國學術場域在「新時期」以前，往往將「淪陷區」文學等同於漢奸文學或靡靡之音；²⁶此前關於「抗戰時期文學」的敘述，向來以共產黨所領導的「解放

¹⁹ 全稱為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

²⁰ 奚密：〈一九三七年迄今的中國文學〉，收於孫康宜主編：《劍橋中國文學史》，頁 621。

²¹ 黃平：〈「新時期文學」的發生：以《今天》雜誌為討論對象〉，收於程光燁編：《文學史的多重面孔：八十年代文學事件再討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48。

²² 趙稀方：〈人道主義〉，《翻譯與新時期話語實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頁 1-2。此處為借用，原文專指 1978 年新華書店的世界文學名著重印事件。

²³ 稍晚還有耿德華（Edward M. Gunn）的英文著作 Edward M. Gunn, Jr. *Unwelcome Muse: Chinese Literature in Shanghai and Peking, 1937-1945*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後由張泉中譯：《被冷落的繆斯：中國淪陷區文學史（1937-1945）》（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年）。

²⁴ 奚密：〈一九三七年迄今的中國文學〉，收於孫康宜主編：《劍橋中國文學史》，頁 630。

²⁵ 李仲明：〈抗戰時期淪陷區文學研究述略〉，《抗日戰爭研究》第 4 期（1998 年），頁 69。

²⁶ 張中良：〈抗戰文學研究的概況與問題〉，《抗戰文學與正面戰場》，頁 224。

區」文學為尊。對於「淪陷區」文學的態度，國共兩黨頗有異曲同工之妙：「淪陷區」文學一直也是解嚴前台灣「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另一個禁區」，因為「八年抗戰所養成的仇日心理作祟，沒有人願意談『漢奸文學』」。²⁷以 1943 年徐訏暢銷一時的長篇小說《風蕭蕭》為例，因為寫作於淪陷時期的上海租界地，在「解放」後的共產中國，被視之為「資產階級反動文藝」，並冠以「特務文學」之名；而在自由中國的一方，《風蕭蕭》雖曾受到黨國文藝評論家王集叢（1906-1990）的肯定，但同時也有「作品中的生活情調太洋化」的批評。²⁸

新時期以降，中國「抗戰文學研究」先後有四川社科院創辦《抗戰文藝研究》、上海「孤島文學」研究，與東北自 1931 年九一八事變起算的「淪陷區文學」研究等三大據點。²⁹亦即，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開始留意「淪陷區文學」作為抗戰戰爭這一特定歷史背景下的特定文學現象，進而在抗戰文學研究的視角上，從「解放區」位移，看見「淪陷區」，甚至擴大了「淪陷區」討論的時間空間，將 1931 年九一八事變後的東北以「東北淪陷時期」³⁰之名，劃入「抗戰時期」的討論範疇。³¹

1980 年 6 月 16 日至 19 日在巴黎召開的「中國的抗戰文學（1937~1945）」國際研討會，便同時有中國學者討論「大後方的抗戰文學」，以及西方漢學家討

²⁷ 李歐梵：〈三十年代文學的研究：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的二十本書〉，《書評書目》第 89 期（1980 年 9 月），頁 31。

²⁸ 王集叢：〈戰鬥文藝的形式〉，《戰鬥文藝論》（臺北：文壇社出版，1955 年），頁 42。

²⁹ 陳青生語。曾祁：〈《抗戰文化研究》編委工作會議紀要〉，收於李建平、張中良主編：《抗戰文化研究》第 10 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 年），頁 306。

³⁰ 例如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持、六十餘所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協作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匯編》，叢書收錄有《抗日戰爭時期國統區文學運動資料》、《抗日戰爭時期淪陷區文學資料》、《東北淪陷時期文學資料》等。陳信元：〈大陸地區抗戰文學書刊介紹〉，收於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社：《當代文學史料研究叢刊》第 2 輯（臺北：大呂出版社，1987 年），頁 16。

³¹ 時至 2015 年，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紀念，抗戰文化的討論更加延展為三期：1931-1937、1937-1945、1945-1949，共和國文學史敘事，將國共戰爭一併納入「抗戰」範疇。文天行：〈抗戰文化運動的分期〉，收於李怡、毛迅主編：《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第 16 輯（成都：巴蜀書社，2015 年 8 月），頁 177。

論「抗戰在東北地區的先兆」。³²這場會議係由法國 Singer-Polignac 基金會以及巴黎第三大學共同籌劃，為期四天，吸引來自歐美的百餘名漢學家與會。不過，這場中國改革開放後的國際會議，並沒有中華民國的學者或作家受邀參與，因此關於「大後方」的抗戰文學討論，便只見延安，不見重慶。於是這場全由「共和國」代表「中國」的研討會，引起「民國」的高度關注。

當時由高信疆主持的人間副刊，自 6 月 12 日就先刊出「巴黎之會的序曲」報導，其後陸續討論「巴黎之會談些什麼？」³³高信疆在 1970 年曾經主持人間副刊「海外專欄」，當時已有海外華裔學者的聯繫譯介經驗；緣此，1980 年的巴黎之會在人間副刊，有來自香港的梁錫華即時連線報導，同日刊出夏志清的會議論文〈端木蕻良的科爾沁旗草原〉節譯版。聯合副刊部分，也在會議首日，呼應夏志清論文的討論，同日刊出前揭的〈抗戰時期作家——蕭紅·蕭軍·端木蕻良〉長文；並且在 6 月 19 日，大會的最後一天，刊載王夢鷗、孫陵、姜貴、謝冰瑩、陳紀澄、周錦等 13 位抗戰時期文藝工作者的訪談，大版面製作專題「沒有中華民國文壇參與，算什麼抗戰文學會議」，指出該場會議「篡改、抹殺史實」，「大談不抗戰的所謂『延安文藝』」。³⁴

由於副刊的篇幅有限，同年 10 月《文學思潮》季刊第 8 期也以這場在巴黎召開的「中國抗戰時期文學會議」為核心，製作「抗戰時期」相關報導。除開是對

³² 梁錫華：〈巴黎之會的序曲：貳·豈能「有啥幹啥」？——喚醒酣睡中的抗戰文學資料〉，《中國時報》第八版（人間副刊），1980 年 6 月 13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 6 位代表出席，分別是艾青（1910-1996）、孔羅荪（1912-1996）、劉白羽（1916-2005）、吳祖光（1917-2003）、馬烽（1922-2004），和高行健（1940-），多為「中國作家協會」幹部；來自美國的有夏志清、葉維廉、許芥昱、李歐梵、董寶中，以及香港的徐訏、梁錫華。

³³ 關於「中國的抗戰文學」討論會，共計 6 篇報導：梁錫華〈出戰孔羅荪〉與〈豈能「有啥幹啥」？——喚醒酣睡中的抗戰文學資料〉、余雙仁節譯夏志清〈端木蕻良的科爾沁旗草原〉、梁錫華〈風暴之眼〉、聶崇章〈巴黎之會談些什麼？〉與〈巴黎風暴：抗戰文學的檢討及中國文學的展望〉，以上見《中國時報》第八版（人間副刊），1980 年 6 月 12、13、16、19、20 及 22 日。

³⁴ 不著撰人：〈沒有中華民國文壇參與，算什麼抗戰文學會議〉，《聯合報》第八版（聯合副刊），1980 年 6 月 19 日。

「中國抗戰時期文學會議」的報導補述，也再次強調抗戰文藝資料建置的重要性，因為不重視文藝工作的「無心之失」，「給了共黨可乘之機，他們以文藝為武器，既竊奪了可愛的美麗的大陸，又扒佔了八年抗戰文藝的成果」。³⁵

巴黎的這場「中國抗戰文學」研討會之所以引起廣泛討論，至少有三重的角力，其一是「民國」與「共和國」在國際參與的競逐，這是一場「民國」缺席的會議。其二在臺灣當時是《聯合報》與《中國時報》競逐百萬大報之際，當人間副刊取得海外連線，聯合副刊則致力於島內各種文藝座談的串連。其三則是這場會議的討論，翻轉了臺灣的文學場域既有的「抗戰文學」定義。用周錦（1928-1992）的話來說，「抗戰文學」是專指表現抗戰的文學作品，受作品內容的限制，但沒有寫作時間的要求；「抗戰時期文學」則是泛指那個時期的所有文學作品，必須寫成於那個時期，然而並不要求一定的內涵。³⁶

因此可以理解五〇年代以降在臺灣的「抗戰文學」，為何多以長篇小說創作為表現形態，³⁷並且在國共二元對立的著墨，實則要大於抗戰本事；七、八〇年代之交，則更聚焦在四十年代「抗戰時期」文學史料的整理。易言之，如果說五〇年代的抗戰小說是一種「產出」，那麼，七、八〇年代的「抗戰時期文學」則是「戰前民國文學」（1912-1945）與「日治時期臺灣文學」（1895-1945）的「匯入」。³⁸

³⁵ 王志健：〈談抗戰文藝〉，《文學季刊》第8期（1980年10月），頁13。《文學思潮》季刊係由「中華民國青溪新文藝學會」主辦，在1978年4月創刊。「青溪文藝學會」成立於1976年，由「後備軍人文藝工作者」組成；1977年底，曾針對「工農兵」文藝，出版《當前文學問題總批判》，試圖「撥亂反正」。

³⁶ 周錦：〈抗戰文學的整理和創作（下）〉，《中央日報》第十二版（中央副刊），1980年7月8日。

³⁷ 如著名的四大抗戰小說：潘人木《蓮漪表妹》（1952）、王藍《藍與黑》（1958）、徐鍾珮《餘音》（1961）和紀剛《滾滾遼河》（1970）。

³⁸ 新世紀則有第三波「抗戰文學」討論，則是民國與共和國、臺灣與中國合作的方法。可參見張俐璇：〈重返江湖，所為何事？——上官鼎《雁城謀影》的「抗戰」書寫〉，《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27期（2018年10月），頁295-322。

三、抗戰時期東北作家的「出土」

1979年，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現代文學研究室」開始編寫《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匯編》；同年「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成立，由撰寫《中國新文學史稿》（1954初版；1982修訂）的王瑤（1914-1989）出任創會會長，研究會並穩定發行會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新時期中國重新開啓對「現代文學經典」的討論，例如中國頭號的文學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曾經在五十年代出版「現代作家選集」；八十年代與香港三聯書店合作，重印「中國現代作家選集叢書」，便納入許多五十年代並未選入的作家作品，嘗試恢復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原本面貌」。³⁹八十年代的叢書便包含有鍾耀群主編的《端木蕻良》。這種「經典」的重構，或曰研究對象評價的變遷，也顯現在臺灣的文學場域：

所謂東北作家，是九一八事變逼出來的。因為他們人數不少，又適值國人注意東北問題，他們來到內地後，所有著作常報告東北在日偽統治下的情況，更有大力者為之吹噓，他們便紅起來了。本來他們的作品，不足佔我這部書的篇幅，不過東北作家群既為當時文壇所樂於稱道，若不提他們一筆，就像缺了典似的，也只有在小說部門最後一章，略為涉及了。⁴⁰

所謂「有大力者為之吹噓」，大抵指涉的是魯迅在1935年將蕭軍《八月的故鄉》

³⁹ 吳自強：〈新時期文學與「名著重印」——以人民文學出版社八十年代版「現代作家選集叢書」研究為例〉，《文藝爭鳴》第2期（2020年），頁7-14。八十年代該叢書有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簡體橫排本，以及香港三聯書店的繁體豎排本。《端木蕻良》一書在兩個版本裡，都是較屬於較晚出版的：三聯版《端木蕻良》出版於1988年；人民版《端木蕻良》出版於1995年。

⁴⁰ 蘇雪林：〈東北作家羣〉，《二三十年代的作家與作品》（臺北：廣東出版社，1979年），頁440。原文「九一八事變」誤植為「九一六」，引文已更正；另，原文「缺了典似的」不確定是否為「點」的訛字，因此不做變更。1979年的《二三十年代的作家與作品》在1983年由純文學出版社重新更名為《中國二三十年代作家》。

和蕭紅《生死場》編為「奴隸叢書」之二、之三出版，並為之寫序推薦；此外又有王瑤在《中國新文學史稿》中，專列「東北作家群」篇章。⁴¹就國民黨立場來看，蕭軍和蕭紅的這兩本書，對於「共匪的抗日宣傳」發生極大的作用，特別是蕭軍《八月的鄉村》寫九一八事變後，東北軍民由共產黨領導組織游擊隊的抗日故事，被國民黨認為是「與共匪誣指政府『勇於內戰而怯於抗日』隱然相和」，⁴²在戒嚴時期臺灣長期被視為禍國殃民的「三十年代文藝」之一。

1979年，蘇雪林鑒於「目前海內外自由人士論著三十年代文學者日見其眾」，因此將1932年起在武漢大學期間的「新文學」課程講義重新整理出版。⁴³基於蘇雪林長年反魯迅的批評位置，該書對東北作家群的評價甚低，然而《二三十年代的作家與作品》一書，在稍後獲得第六屆國家文藝獎「文藝理論類」文藝批評獎。獎項背後肯定的，不無以文藝批評「撥亂反正」的治理效用。

在此脈絡下，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更新，以及1980年的巴黎之會，反而給予東北作家在臺灣的文學場域重新現身的機會：一則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與重刊中獲得討論；二則離開左翼魅影的「三十年代」，來到「抗戰時期」的作家定位。

相應於1979年中國有學術單位編寫《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匯編》，也有全國性社會團體出版會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0年臺灣有成文出版社編印「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3輯30冊，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的文藝班第五期也改以「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為主。⁴⁴因為在臺灣的「我們的政府是中華民國正統的政府，我們當代文學是新文學的一線相承」，因此即便「民國三十八年之

⁴¹ 蘇敏逸：《流浪者之歌：「東北作家」的鄉土敘述與社會記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20年），緒論，頁1。「奴隸叢書」由上海奴隸社出版、容光書局發行，叢書之一為葉紫《豐收》。

⁴² 見玄默：〈蕭軍與蕭紅〉。

⁴³ 蘇雪林：《二三十年代的作家與作品》，自序，頁3。

⁴⁴ 谷鳳翔：〈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收於尹雪曼總編輯、周錦主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臺北：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印行，1980年），頁1。文藝班課程有柯慶明談「光復前臺灣新文學概況」，也有鍾肇政談「省籍作家與其作品」。

前新文學的作家和作品中，有些是左傾的」，但「我們對新文學發展的史料應該有總的整理和全盤的瞭解」，方能有「批判性的接收」。⁴⁵

出於先前「抗戰文學是新文學運動的開花結果」的呼籲，⁴⁶叢刊中以「抗戰時期」為主題者，⁴⁷就有劉心皇《抗戰時期淪陷區文學史》、舒蘭《抗戰時期的新詩作家和作品》以及尹雪曼《抗戰時期的現代小說》，此外，也有周錦專著《論「呼蘭河傳」》與《「圍城」研究》，聚焦「淪陷區」文學研究。不過1980年畢竟還是白色恐怖的年代，臺灣的文學場域究竟看見「淪陷區」的什麼？首先可以留意到的是，無論是蕭紅《呼蘭河傳》抑或錢鍾書的《圍城》，小說原作皆未在臺重新出版，⁴⁸代之是以「評傳」、「研究」的論述面貌出現。並且，由於東北作家的「左翼」色彩，周錦在成文出版社編印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的《論「呼蘭河傳」》一書中，特別「消毒」：

蕭紅於民國三十一年去世，一生受盡了共產黨人的害，可是在不能講話了之後，卻被中共推崇為無產階級重要作家之一，以致作品在自由地區不能

⁴⁵ 編輯委員（尹雪曼、周錦、姚朋、孫如陵、孫陵、夏志清、夏鐵肩、陳紀滢、黃章明、葛浩文、趙友培、錢江潮）：〈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編印緣起〉，收於尹雪曼：《五四時代的小說作家和作品》（臺北：成文出版社，1980年），頁1。成文出版社由黃成助在1964年成立，與美國亞洲學會中文研究資料中心多有合作，以「漢學研究」和「中國、臺灣史料文獻」為兩大出版方向。吳栢青：〈見證歷史，索覽尋根：成文出版社〉，收於封德屏主編：《台灣人文出版社30家》（臺北：文訊雜誌社，2008年），頁124。

⁴⁶ 朱介凡語。彭碧玉、丘彥明整理：〈文學的歷史不容篡奪！——抗戰文學的保衛與整理（上）〉，《聯合報》第十二版（聯合副刊），1979年7月6日。

⁴⁷ 另以「三十年代」為題者，則有陳紀滢《三十年代作家記》、孫陵《我熟識的三十年代作家》，以及陳敬之《三十年代文壇與左翼作家聯盟》。這裡有意思的是，可以看出陳紀滢、孫陵與「三十年代作家」的往來關係。而兩人在戰後臺灣，俱為五〇年代反共的要角：孫陵作詞〈保衛大臺灣〉（1949）打響反共文藝的第一炮、陳紀滢發表長篇小說《荻村傳》（1950）。若從「民國文學」的角度來看戰後臺灣的反共文藝，這種反共宣告的「即時性」，實是作家在新的文學場域裡「安身立命」的方式。

⁴⁸ 由姚一葦主編的《現代文學》復刊第21期「抗戰文學專號」刊有張迺瑩（蕭紅）〈曠野的呼喊〉和端木蕻良〈風陵渡〉。

廣為流傳。相信這種情形不會長久，因為真正的文學作品，尤其是有水準的作品，是不可能奴役於政治的。⁴⁹

初版於 1942 年的《呼蘭河傳》，創作於抗戰時期，不過內容上「不關係抗戰」，就周錦來看，《呼蘭河傳》的前四章是散文，後三章是獨立的短篇小說。⁵⁰特別是第一章，周錦指出這個片段在「抗戰勝利之後，曾被節選編入初中國文課本」，⁵¹盛讚其「文字的功力和寫作的水準」；相較之下，對於《呼蘭河傳》第五章的小團圓媳婦（童養媳），和第七章的磨坊工人馮歪嘴子，這兩個悲劇人物際遇，則置放在「鄉土氣息」以及「舊社會」中「人性」可愛的討論。⁵²

稍晚，謝霜天（1943-）依據蕭紅的傳記資料，創作長篇小說《夢迴呼蘭河》（1982）。之所以援用蕭紅的生平寫作「人物小說」，在謝霜天有著更大的企圖：一則是蕭紅個人的顛沛流離，實也是苦難中國的故事；二則是「要把三十年代中國文壇的真實情況寫出來」，而這個「真實情況」就在於「那個時代除去政治鬥爭外，也還有真正的作家和作品」。⁵³謝霜天「再創作」的動機，不無將「三十年代文學」洗「白」⁵⁴的用心。這種「去政治化」的創作努力，也與周錦的評論方向相應。

此外，夏志清的研究〈端木蕻良的科爾沁旗草原〉在臺灣也再次「重刊」。⁵⁵作為《現代文學》「抗戰文學專號」的第一篇文章，夏志清指出端木蕻良、蕭紅、

⁴⁹ 周錦：《論「呼蘭河傳」》（臺北：成文出版社，1980年），頁5。

⁵⁰ 周麗麗筆記、周錦演講：〈關於抗戰文學〉，收於尹雪曼總編輯、周錦主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頁102。

⁵¹ 周錦：〈論「呼蘭河傳」〉，《論「呼蘭河傳」》，頁19。

⁵² 周錦：〈「呼蘭河傳」的鄉土氣息〉，同前註，頁64。

⁵³ 謝霜天：〈我寫「夢迴呼蘭河」〉，《夢迴呼蘭河》（臺北：爾雅出版社，1982年），頁6。

⁵⁴ 「當毛澤東以三十年代文學為『黑線』，自由中國也有許多人以三十年代文學為『紅線』」。胡秋原：〈結成一座鐵的長城〉，收於蘇雪林等著：《抗戰時期文學回憶錄》（臺北：文訊月刊雜誌社，1987年），頁150。

⁵⁵ 這裡所謂的「重刊」並非原文照錄，而是繼1980年夏志清在巴黎「抗戰文學」國際會議之後，同名論文的再一次深論，以及1974年夏志清在麻州Dedham的中國現代文學研討會論文“The Novels of Tuan-mu Hung-liang”的延伸。

蕭軍等在「三十年代早期逃離偽滿洲國」的青年作家，所代表是的反日的「愛國精神」以及出身於東北的「鄉土意識」。無論是「愛國」抑或是「鄉土」，俱是鄉土文學論戰、美麗島事件後，臺灣的文學場域的重要關鍵字。夏志清認為，單就端木蕻良《科爾沁旗草原》來看，其中地主家庭的故事，就有如《紅樓夢》中的「榮國府被移植到荒野」，在這片草原上，先後面對俄國、日本的「合法剝削」；而這些經濟史、家史方面的書寫關懷，讓端木蕻良在三十年代小說家中，是可「與茅盾相提並論」的，兩者皆描寫了「中國在外國帝國主義控制下，日益衰敗的經濟」。不過即便這塊代表「中國」的東北土地，如何有頹敗的地主、思想封建的鄉人，夏志清感受到小說家「正像沈從文，仍然是那麼不可動搖地深信中國的善良」，並「確言中國人民天生的英勇，這與他認為無產階級高貴的政治信仰無關」。在這樣的分析脈絡下，最受到凸顯的，還是「中國」的良善，以及面對的「外侮」。閱讀過程中所預期的地主與佃農的階級對抗，在小說最後並沒有出現，代之，出現的是「全民覺醒」的「舉國抗日」。⁵⁶

夏志清之於《科爾沁旗草原》，與周錦之於《呼蘭河傳》，兩者的析論方式有些類似性，一是將小說中的階級矛盾，「上升」到人性普遍性的肯定；二是評論中皆有大篇幅的小說引文。這一點，可謂是「戰前民國文學」「登臺」的一大特色，從林海音在《純文學》月刊的「近代中國作家與作品」專欄，便是如此在評論中「挾帶」原著刊出。⁵⁷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由姚一葦和鄭樹森主編的「抗戰文學專號」堪稱是當時臺灣文學場域中關於「抗戰文學史料」整理的異數／藝術。有鑒於「四十年代，抗戰中期的文學作品，每受到忽略」，專號在蒐錄上，特別「不選那些廣為流傳的作家，而著重於優秀但未受到很大注意的作品」。⁵⁸這其實是則相當耐人尋味的

⁵⁶ 杜國清譯、夏志清：〈端木蕻良的「科爾沁旗草原」——作者生平與作品研究〉，頁9、11、21-22及36-37。

⁵⁷ 例如老舍的〈月牙兒〉是被包裹在菱子的〈談老舍及其文體〉之中；1980年結集為《中國近代作家與作品》出版的時候，老舍的小說與評論才被分開列出。李京珮：〈曲折的縫綴：《純文學》對五四作家的接受〉，頁93。

⁵⁸ 姚一葦：〈編輯前記〉，《現代文學》復刊第21期（1983年9月），頁4。

編輯前記，因為如果對照收錄篇章，會發現仍有陳紀滢、王藍、謝冰瑩等親國民黨文藝體制且「廣為流傳」的作家；而所謂的「未受到很大注意的作品」則有英國詩人奧登（Auden）1938年在中國寫的「戰時作」（In Time of War）十四行詩，直接以蕭紅原名張迺瑩刊載她的短篇小說〈曠野的呼喊〉、端木蕻良〈風陵渡〉以及羅洪（1910-2017）〈王伯炎與李四爺〉等東北、上海作家作品。

之所以說《現代文學》抗戰文學專號，是八〇年代初同時期「抗戰文學史料」整理的異數／藝術，便在於它的選錄，既有親官方的思維，又有自己的關注。前者如奧登詩作的刊錄，極其類似《文學思潮》季刊的「抗戰回顧報導」專輯策劃，重刊海明威1941年在紐約《午報》的戰地報導，因為海明威「盛讚我國的抗戰精神，並駁斥中共的邪曲宣傳」。⁵⁹後者則藉由蕭紅、端木蕻良、羅洪等東北、上海作家的選刊，將「抗戰時期文學」的視野，從官方的「國統區」擴及「淪陷區」。這些「淪陷區」的作家作品，之所以「優秀但未受到很大注意」，一則多因作家名列戒嚴時期臺灣的《查禁圖書目錄》，二則亦因作品並未「直面抗戰」。謝冰瑩和張迺瑩便是一組鮮明的對照，前者在專號中的兩篇文章〈踏進了偉大的戰場——台兒莊〉、〈幾個為國犧牲的無名女英雄〉，篇名的「抗戰」色彩強烈；而張迺瑩〈曠野的呼喊〉從「風撒歡了」⁶⁰寫起，看似甜甜，但實際上大風混著烟塵，一如陳公公與陳姑媽在高粱田間的鄉村生活，苦甜相隨。通篇所謂的「抗日」僅出現在為日本人修築鐵道的兒子遇害，但小說最後陳公公尋找兒子的呼喊，徒勞消聲在曠野的大風裡。如此這般的「抗戰文學」雖說「戰得」幽微，但更具「抗力」。⁶¹

⁵⁹ 宋廣仁：〈抗戰中海明威的訪華行程〉，《文學思潮》第12期（1982年7月），頁80。

⁶⁰ 張迺瑩：〈曠野的呼喊〉，《現代文學》復刊第21期（1983年9月），頁297。

⁶¹ 就這一點來說，《現代文學》一直到復刊號，始終沒有偏離《文學雜誌》的定位：「我們反對共產黨的煽動文學。我們認為：宣傳作品中固然可能有好文學，文學可不盡是宣傳，文學有它千古不滅的價值在。」不著撰人：〈致讀者〉，《文學雜誌》創刊號（1956年9月），頁70。換句話說，《文學雜誌》與《現代文學》一直保持著和黨國文藝體制相近又另有發展的位置。

四、戰爭期臺灣新文學的「重整」

劉心皇《抗戰時期淪陷區文學史》原稿分為「落水作家」（即漢奸）、「抗日作家」以及「動向不明的作家」三部分，後經周錦建議，指出「抗日作家」等同「抗戰文學」，而動向不明作家直接可略去，因此後來《抗戰時期淪陷區文學史》定稿三卷為「南方偽組織」、「華北偽組織」與「東北偽組織」的文學。這裡很有意思的是，張深切（1904-1965）出現在「華北偽組織的文藝作家」之列。不過劉心皇附註道，當時的張深切是以「福建龍溪人」身分，在北平從事偽文藝活動；劉心皇來台後看到張深切《我與我的思想》一書，方知他是臺中人。緣此，劉心皇特別強調由於臺灣被清廷割讓於日本，因此「後來臺灣出生的人，被迫為日人工作便不能以落水視之。」⁶² 換句話說，臺灣因為歷史的特殊性，並不屬於「淪陷區」，但這樣的狀況下，該如何整合「抗戰時期」的「中國現代文學」？相較於共和國後來以「日占區」取代「淪陷區」，藉以涵蓋 1895 年被割讓的臺灣和 1941 年太平洋戰爭後被攻佔的香港；⁶³ 戒嚴時期的民國則以「光復前臺灣」指稱日治時期台灣。

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共和國與民國對於「抗戰時期文學」的討論，促發了對「淪陷區文學」的關注，在臺灣的文學場域，除開中國東北作家作品的介紹之外，還有的就是同樣擁有「抗日經驗」的臺灣文學研究。不過，關於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學，其實早在一九七〇年代初期，就已獲得「重新出土」的機會：

日據時代的抗日文學，因為與中國新文學傳統有共通的反帝封建精神，在民族主義與反日情緒高漲，而中國三〇年代文學又不容公開引入的時代中，

⁶² 劉心皇：〈華北偽組織的文藝作家（一）〉，《抗戰時期淪陷區文學史》（臺北：成文出版社，1980年），頁274。

⁶³ 黃萬華：〈流動的文學史視野中的日占區文學〉，收於李怡、毛迅主編：《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第17輯（成都：巴蜀書社，2015年11月），頁267。

臺灣本土文學就以中國五四新文學傳統之流的身分，受到民族主義論者青睞……⁶⁴

這種將「日治時期臺灣文學」作為「中國三十年代文學」的「替代」，可見諸1973年顏元叔在《中外文學》討論〈臺灣小說裡的日本經驗〉，抑或1974年《文季》重刊楊逵小說〈模範村〉等。其後在「官方民族主義」⁶⁵的收攏下，「日治時期臺灣文學」以「臺省光復前的文藝概況」之名，兼之以「附錄」的形式，在《中華民國文藝史》（1975）被納入「中國新文學的架構」⁶⁶之中。

1978年10月，聯合副刊的「光復前臺灣文學」座談會中，郭水潭（1907-1995）提及「今天我們應該提出一些《中華民國文藝史》沒有談到的部分，以補其不足。」⁶⁷所謂「沒有談到的部分」，有當時尚未出土整理的史料，也有無法收束在當時官方民族主義裡的篇章。1979年7月，遠景出版社便將「日據下的臺灣新文學運動」作為「中國抗日的民族文化鬭爭的一環」，推出「光復前臺灣文學全集」。⁶⁸這套全集的出版意義之一在於「臺灣才真正開始面對日治時期皇民文學的作者」，⁶⁹全集收錄有當時頗富爭議的王昶雄小說〈奔流〉。⁷⁰或許可以這樣推

⁶⁴ 游勝冠：〈七〇年代以後臺灣文學本土論的建構〉，《臺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臺北：群學出版社，2009年），頁251。

⁶⁵ 李知灝：〈「被嫁接」的臺灣古典詩壇——《中華民國文藝史》中官方古典詩史觀的建構〉，《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5期（2007年10月），頁198。

⁶⁶ 黃怡菁：〈文學史的書寫形態與權力政治：以《中華民國文藝史》為觀察對象〉，《臺灣學誌》創刊號（2010年4月），頁85。

⁶⁷ 郭水潭語。聯合報編輯部：〈傳下這把香火——「光復前臺灣文學」座談會〉，收於《寶刀集：光復前臺灣作家作品集》（臺北：聯合報社，1981年），頁233。

⁶⁸ 張恆豪、林梵、羊子喬：〈出版宗旨及編輯體例〉，收於葉石濤、鍾肇政主編：《光復前臺灣文學全集1：一桿秤仔》（臺北：遠景出版社，1997年），頁1。

⁶⁹ 杜國清：〈「臺灣皇民文學專輯」卷頭語〉，收於杜國清、羅德仁主編：《臺灣文學英譯叢刊No.37：臺灣皇民文學專輯》（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年），頁xxvii。

⁷⁰ 但未收入周金波〈水癌〉以及陳火泉〈道〉，特別是後者在1945年經常發表各種「翼贊戰爭國策」的皇民文學作品。陳采琪：〈緒論〉，《跨時代的「皇民文學」作家——陳火泉研究》（新竹：清大台文所碩士論文，2015年1月），頁2。

論，在「抗戰時期文學」的討論脈絡之下，關於「皇民文學」的討論，因而擁有「復歸」的可能，並且因為正視殖民地的現實，對其文學討論，也不再僅止於民族主義面向。

「光復前臺灣文學全集」中的許多日語作家，在戰後臺灣文壇的知名度不高，因此在全集出版前，有杜文靖（1947-2010）主編的《自立晚報》自立副刊（1977-1981），以及鍾肇政主編的《民眾日報》民眾副刊（1978-1980）等先前刊登譯文。⁷¹當時任職遠景出版社的羊子喬（1951-2019）曾自言，這些老作家的作品，最主要拿給《自立晚報》副刊，再來就是《民眾日報》副刊，一小部分給《聯合報》副刊的主編瘧弦自己挑選，「因為他跟《中國時報》在競爭」。⁷²

也因此《寶刀集》的出版，亦可以在這波「戰爭期臺灣新文學」討論中來看。1980年6月巴黎的抗戰文學會議的同個月底，紅毛城正式回歸中華民國。紅毛城「收歸國有」的第三天，聯合副刊邀約一批「光復前寶刀」前往憑弔，並在紅毛城舉辦「光復前臺灣文學中的民族意識與抗日精神座談會」，瘧弦、黃武忠由此進一步規劃《寶刀集》，邀請「光復前臺灣作家」針對「日據時代」再創作。

當時 72 歲的王詩琅，為《寶刀集》撰文時候，視力已經極差，他拿著放大鏡寫作，交稿〈沙基路上的永別〉，這是他在「光復三十餘年來的第一篇小說」。小說的特別之處在於，王詩琅以「抗戰時期」曾在廣州《訊報》擔任記者的經驗，書寫「臺灣人在民國」的喜與憂。小說中的敘事者「我」任職臺灣開發株式會社，「臺發」配合戰時國策，推動華南侵略事宜，因此「我」被外派廣州，協助日軍調遣軍需。敘事者「我」喜的是能夠親赴廣州這「久年渴望著的祖國革命策源地」，憂的則是「臺灣人已經是日本的籍民」。小說篇名的「沙基」是「六二三路」的舊稱，新路名是為紀念發生於 1925 年 6 月 23 日的沙基慘案。當時沙基的對岸是屬於英、法、葡萄牙等國的沙面租界，是「國人的土地」、「自己的鄉

⁷¹ 王惠珍：〈析論 1970 年代末台灣日語文學的翻譯與出版活動〉，《譯者再現：台灣作家在東亞跨語越境的翻譯實踐》（新北：聯經出版公司，2020 年），頁 239。

⁷² 黃崇軒：〈黃崇軒訪問羊子喬紀錄〉，《建構本土·迎向群眾——《自立副刊》研究（1977-1987）》（臺中：靜宜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7 年 7 月），頁 141。

土」，但不被允許自由出入。沙基慘案源自為響應援助上海五卅慘案的遊行，實與共產國際相關，不過在小說中突顯的是來自租界地的「外侮」。「外侮」的傷痕歷歷，小說中的「民國女子」緣此無法接受日本籍臺灣人「我」的求婚，兩人在沙基路上永別。小說職是結束在「我」的吶喊：「臺灣人不是日本，絕對不是！」、「臺灣人永遠是漢民族呀！」⁷³〈沙基路上的永別〉在 1981 年獲得《聯合報》小說推薦獎，固然小說收束在同為「漢民族」的旗幟下，但箇中呈現的是戰前「民國」與「臺灣」的歷史歧異。

五、結語：抗戰的抗戰

2015 年，目宿媒體「他們在島嶼寫作」文學大師系列紀錄片《如歌的行板》上映，UDN TV「藝想世界」節目在前一年已製作十分鐘報導影片，節目介紹到，詩人痲弦在《聯合報》副刊主編任內，推出「光復前作家」專欄，並在 1981 年出版《寶刀集：光復前臺灣作家作品集》「力挺鄉土文學」。⁷⁴這樣的介紹，不能說有誤，但背後其實有著更複雜的歷史脈絡。特別是提及鄉土文學，不難聯想到《寶刀集》稍早的鄉土文學論戰期間，聯合副刊所扮演的角色：在 1977 年 8 月一連四日刊出彭歌〈不談人性·何有文學〉和余光中〈狼來了〉兩篇文章，前者直接點名批判王拓、陳映真和尉天驄；後者將「鄉土文學」與中共的「工農兵文藝」劃上等號，「被視為論戰氛圍轉向政治肅殺的代表作」。⁷⁵兩個月後，聯合副刊主編人事變更，由痲弦接替馬各。1978 年 1 月，軍方出面召開「國軍文藝大會」，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王昇在演講中，將「鄉土文學」定調為「國家之愛、民族之

⁷³ 王詩琅：〈沙基路上的永別〉，收於聯合報編輯部編：《寶刀集——光復前臺灣作家作品集》，頁 95、109、110 及 113。

⁷⁴ 黃惠玲主持：〈「藝想世界」紀錄片《如歌的行板》拍攝詩人痲弦的人生〉，網站（<https://ppt.cc/fnnY9x>），5:48~5:58 分處，2014 年 10 月 29 日發表。（檢索日期：2021 年 11 月 10 日。）UDN TV 是聯合報系在 2012 年開始的網路電視頻道。

⁷⁵ 王智明、林麗雲、徐秀慧、任佑卿編：《回望現實·凝視人間——鄉土文學論戰四十年選集》（臺北：聯合文學，2018 年），頁 6。

愛」，呼籲「團結鄉土」，鄉土文學論戰至此「和諧」落幕。

本文因此由 1978 年談起，這一年初是臺灣的鄉土文學論戰落幕，年底是中國的改革開放。易言之，一九七、八〇年代之交臺灣的文學場域，既須「安內」也須「攘外」。也因此，當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上的變化，以及對於「抗戰時期文學」的詮釋，臺灣的文學場域既有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抗戰文學研究的抗戰，同時也有對中華民國抗戰文學研究的抗戰。八〇年代初臺灣的文學場域，可謂兵分三路：有國民黨觀點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有自由人文主義觀點的「東北作家作品重刊」，也有日治時期臺灣新文學借力使力的重整。於是如同 1966 年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發生，使得老舍有機會在臺灣的《純文學》月刊現身；1978 年底改革開放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更新，讓「三十年代作家」端木蕻良得以從「抗戰時期作家」名目獲得掩護「出土」。

不過，本文也試圖指出，固然 1987 年臺灣解嚴被視為「全面開啓中國現代文學重新被臺灣社會認識接受的新時代」，⁷⁶但這一年同時也是中華民國「七七事變」的五十周年紀念，臺灣的文學場域有《聯合報》副刊舉辦「抗戰文學獎」徵文，也有國民黨文工會創刊的《文訊》月刊雜誌社推出「抗戰文學資料叢書」3 冊，並舉辦為期兩天的「抗戰文學研討會」。這些活動顯示：具有反共性質的現代文學詮釋的反攻，並未隨著解嚴停歇。換句話說，解嚴不代表一切禁制的終結，以香港三聯書店和北京人民出版社聯合編輯的「中國現代作家選集叢書」為例，出版於 1988 年香港版的《端木蕻良》一書，在今天的臺大圖書館裡，仍可以看見圖書館特藏組在 1989 年「受領」的註記，以及「特種資料／限制閱覽」的貼紙。

「中國現代文學」的全面解禁，以及不再心懷反共與反攻的「抗戰文學」研究，大抵要到 1992 年。這一年 1 月在中國「鄧小平南巡」深圳等經濟特區，加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⁷⁷掀起臺商赴中國投資熱潮；同年 7 月 7 日在臺灣，中華民國政府正式取消海外黑名單返臺禁令，開啓另一種「七七」故事。

⁷⁶ 黃惠禎：〈郭沫若文學在臺灣：其接受過程的歷史考察〉，《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16 期（2013 年 4 月），頁 245。

⁷⁷ 王丹：〈經濟與文化〉，《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十五講》（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 年），頁 334-355。

附錄：1978-1992 年間「抗戰文學」相關紀事

時間	中國文史紀事	臺灣的文學場域「抗戰」相關活動
1978	5月，中國《光明日報》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提出「新時期」概念。 8月，上海《文匯報》刊登盧新華短篇小說〈傷痕〉 12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第三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三中全會）確立改革開放政策	1月，國軍文藝大會召開，鄉土文學論戰落幕。 4月，《文學思潮》季刊創刊，由「中華民國青溪新文藝學會」主辦。 10月，聯合副刊召開「光復前的臺灣文學」座談會。
1979	1月，中美建交 金門結束「單打雙不打」 中國教育部決議在高等院校範圍內成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 4月，《讀書》創刊，是「以書為中心的思想文化評論雜誌」 6月，北京《當代》雜誌刊載白先勇〈永遠的尹雪豔〉，是第一篇發表於中國的臺灣小說 11月，「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發行會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1月，周錦主編「中國新文學創作叢刊」系列，含《中國的苦難》、《中國的怒吼》、《中國的奮鬥》與《中國的勝利》4冊 ⁷⁸ 3月，李南衡主編《日據下臺灣新文學》5冊由明潭出版社出版 6月，《青年戰士報》 ⁷⁹ 舉辦「抗戰文學作品·民族精神火花：抗戰中的文藝」座談會 ⁸⁰ 7月，葉石濤、鍾肇政主編《光復前臺灣文學全集》8冊由遠景出版社出版《聯合報》聯合副刊「文學的歷史不容篡奪！」 ⁸¹

⁷⁸ 由周錦（1928-1992）創辦並擔任發行人的智燕出版社出版。

⁷⁹ 《青年戰士報》與「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同於1952年成立，同為時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的蔣經國主持。《青年戰士報》最初是四開一張的小型報紙，以三軍官兵和青年學生為發行對象；1957年擴版為對開一張的大型報紙，並開放社會大眾訂閱。傅星福：《軍方刊物對民主運動的報導：以《國魂》與《青年戰士報》為例》（臺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頁13-14。

⁸⁰ 與會作家學者包括趙滋蕃、鳳兮（馮放民）、墨人、應未遲、尼洛等五十年代黨國文藝大家。

⁸¹ 陳紀滢表示「中共破壞抗戰，也破壞抗戰文學」，以及毛一波認為「不能因為抗戰文壇有左傾份子就否定抗戰文學的價值」。彭碧玉、丘彥明整理：〈文學的歷史不容篡奪！——抗戰文學的保衛與整理（上）〉。

	<p>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現代文學研究室」開始編寫《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匯編》</p>	<p>墨人在中央副刊表示抗日與反共是一體兩面的事，因為「沒有抗日戰爭，就沒有共黨的坐大」⁸²</p> <p>8月，謝嘉珍主編「抗戰文選」8冊（盧溝曉月、漫天烽火、中原鐵流、戰地笛韻、八方風雨、黯黯行雲、山城曙色、凱歌還鄉）⁸³</p>
<p>1980</p>	<p>6月，法國 Singer-Polignac 基金會主辦之「中國抗戰文學（1937-1945）」國際研討會，在巴黎第三大學召開</p>	<p>5月，劉心皇《抗戰時期淪陷區文學史》</p> <p>6月，《中國時報》人間副刊連日報導「巴黎之會談些什麼？」</p> <p>鄭繼宗譯葛浩文《蕭紅評傳》由時報出版</p> <p>紅毛城正式回歸中華民國，聯合副刊在紅毛城舉辦「光復前臺灣文學中的民族意識與抗日精神座談會」在紅毛城舉辦「光復前臺灣文學中的民族意識與抗日精神座談會」</p> <p>7月，舒蘭《抗戰時期的新詩作家和作品》尹雪曼《抗戰時期的現代小說》</p> <p>8月，胡秋原〈抗戰與抗戰文學〉《中華雜誌》</p> <p>10月，《文學思潮》季刊第8期「大學生看副刊」專輯⁸⁴</p> <p>11月，周錦主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由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發行，〈光復前臺灣新文學概況〉為其中篇章</p>

⁸² 墨人：〈抗戰文學的整理與再創作（上）〉，《中央日報》第十版，1979年7月25日。

⁸³ 「抗戰文學」8冊由長橋出版社出版。長橋出版社創辦人為鄧維禎，1974年曾與王榮文、沈登恩創立遠景出版社；1991年與妻子黃寶雲成立鹿橋文化事業公司。

⁸⁴ 本期是《文學思潮》季刊的第一次專輯策劃，但同期有高達9篇關於「抗戰」的討論文章，包括王志健〈談抗戰文藝〉、墨人〈抗戰文學的整理與再創作〉、周錦〈抗戰文學的整理和創作〉、南郭〈中共「文藝統戰」見聞：漫談抗戰期間中共文藝統戰〉、趙滋蕃〈這樣的創痛還要沉默？〉、紀剛〈抗戰時期的東北文壇〉、董保中〈倥傯錄：巴黎七日〉、梁錫華〈記巴黎的所謂「抗戰時期文學研究會」〉與〈「巴黎研討會」兩則〉。

時間	中國文史紀事	臺灣的文學場域「抗戰」相關活動
1981	1月，蕭軍《蕭紅書簡輯存注釋錄》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單行本。 9月，葉劍英發表「有關和平統一臺灣的九條方針政策」，臺灣文學「成爲了中國了解臺灣人民的生活與意識型態之重點研究對象」 ⁸⁵	9月，王詩琅〈沙基路上的永別〉獲《聯合報》小說推薦獎 10月，《寶刀集：光復前台灣作家作品集》由聯經出版
1982	上海電影製片廠攝製林海音《城南舊事》（吳貽弓導演） 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修訂重版 ⁸⁶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四十周年 5月，香港三聯書店與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聯合編輯「中國現代作家選集」叢書，香港版《蕭紅》出版 ⁸⁷ 6月，廣州暨南大學舉辦中國第一次「台灣文學研討會」	1月，《文學界》季刊於高雄創刊 7月，呼嘯總編輯《文學思潮》季刊第12期「國家文藝獎與評介」專輯+「抗戰回顧報導」專輯 ⁸⁸
1983	中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陳映真小說選》	1月，《文學界》重刊《文友通訊》 9月，姚一葦、鄭樹森主編《現代文學》復刊21期「抗戰文學」專號
1984	黃修己《中國現代文學簡史》（中國青年出版社）談及淪陷區文學	2月，《文訊》第七、八期合刊「抗戰文學口述歷史」專輯 ⁸⁹ ，有林芳年〈抗戰時期的鹽分地帶文學人物〉、

⁸⁵ 「有關和平統一臺灣的九條方針政策」，簡稱「葉九條」統戰宣言。林瑞明：〈兩種臺灣文學史——臺灣 vs. 中國〉，《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7期（2008年10月），頁127。

⁸⁶ 謝泳：〈《中國新文學史稿》的版本變遷〉，《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6期（2009年），頁134。

⁸⁷ 該叢書在香港與中國各有正體字版與簡體字版，臺大圖書館的香港版，目前可見有《許地山》（1982）、《蕭紅》（1982）、《鄭振鐸》（1986）、《巴金》（1986）、《端木蕻良》（1988）、《林徽因》（1990）六書，除《林徽因》之外，前五書皆為臺大圖書館「特藏組」在1989年「受領」，右上角皆有「特種資料／限制閱覽」貼紙。

⁸⁸ 本期「抗戰回顧報導專輯」計有文章15篇，其中9篇為宋廣仁譯介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 1899-1961）在1941年應紐約《午報》之邀訪華的文章。

⁸⁹ 其後結集為蘇雪林等著：《抗戰時期文學回憶錄》。

	9月，福建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文聯）創辦《台港文學選刊》（雙月刊），是中國第一家專門介紹港澳台及海外華文作家作品的文學期刊	陳火泉〈我在臺灣淪陷時期的文學經驗〉、龍瑛宗〈崎嶇的文學路：抗戰文壇的回顧〉（提及郁達夫1936年底到臺灣）
1985	蘇光文《抗戰文學概觀》由西南師範大學出版 「中國現代文學館」於北京成立，隸屬「中國作家協會」 5月，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座談會」上提出「20世紀中國文學」	5月，龍瑛宗小說集《午前的懸崖》由蘭亭書店出版 7月，《幼獅文藝》379期「抗戰勝利四十年紀念」專輯
1986	北京、上海、青島、哈爾濱等地，相繼舉行「新時期文學十年」學術研討會	
1987		7月，解嚴 《聯合文學》33期「抗戰文學」專號 黎明文化出版8冊「抗戰文選」 ⁹⁰ 《文訊》舉辦「抗戰文學研討會」 ⁹¹ ，並出版《抗戰文學概說》 ⁹² 9月18日，聯合副刊公告「抗戰文學獎」徵文 12月，《當代文學史料研究叢刊》2「抗戰文學專輯（上）」

⁹⁰ 由張放、朱星鶴、吳東權、姜穆4位軍中作家主編，8冊分為小說類《三千里長江》、《故園》；散文類《古城的呻吟》、《嘉陵江的依戀》；報導類《烽火歲月》、《神州鼎沸》；傳記類《浩氣壯山河》、《英風照日月》。

⁹¹ 有黃武忠在前揭《寶刀集》基礎上，發表〈抗戰時期臺灣地區的文學活動〉，介紹「抗戰時期」6位台灣作家：張文環、呂赫若、龍瑛宗、楊雲萍、王昶雄、葉石濤；也有盧瑋鑾談「抗日時期香港的文藝活動」、王潤華談「中國作家對新馬抗戰文學的貢獻」等。「抗戰時期文學」的討論範疇，已經不限於中國大陸，而是海內外華人的共同記憶、華文文學的一部分。

⁹² 李瑞騰主編的《抗戰文學概說》分為上篇「抗戰時期的文學」以及下篇「關於『抗戰文學』的討論」兩部分。上篇同時包含有〈抗戰時期的東北文壇〉以及葉石濤〈戰爭期的臺灣新文學〉（原為《臺灣文學史綱》第2章第3節）。

時間	中國文史紀事	臺灣的文學場域「抗戰」相關活動
1988	「中國統一聯盟」在台成立。 中國國務院通過〈關於鼓勵台灣同胞投資的規定〉	2 月，秦賢次〈抗戰時期的文學社團〉 《文訊》 ⁹³ 10 月，《當代文學史料研究叢刊》3「抗戰文學專輯（下）+新月派專輯（二）」
1989	六四天安門事件 《東北現代文學史》出版（瀋陽出版社）	4 月，張文翰〈七七抗戰回顧與省思〉 《湖南文獻季刊》 《聯合報》第十屆小說獎暨抗戰文學獎由鄭兆沅〈八年歲月〉獲得
1990		6 月，劉惠璇〈抗戰時期知識分子的困境：以西南聯大師生為主體的研究〉 《警專學報》
1991	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第三卷（人民文學出版社）分析淪陷區小說	2 月，翟志成〈國民黨是怎樣丟掉大陸的？〉 《當代》 5 月，〈動員戡亂臨時條款〉廢止，結束兩岸軍事對峙 7 月，蔡國裕〈抗戰期間中共建立的邊區和根據地〉 《共黨問題研究》 8 月，蔣永敬〈胡適與抗戰〉 《近代中國》 10 月，吳奚真〈抗戰時期的「時與潮」〉 《傳記文學》
1992	1-2 月，鄧小平南巡，加速改革開放進程，掀起台商赴中國投資熱潮	5 月，刑法 100 條修正通過，終結臺灣白色恐怖時期 7 月，中華民國政府正式取消海外黑名單返臺禁令 8、9 月，楊松年〈新馬抗戰文學的定位問題：對抗戰文學口號的兩種不同心態〉 《文訊》43、44 期 12 月，香港三聯書店「中國現代作家選集」叢書，授權台灣書林出版社發行，《許地山》、《蕭紅》等，不再被貼註為「特種資料／限制閱覽」書籍

⁹³ 《文訊》下次出現關於「抗戰時期」的文章，要到 2010 年，鐘麗慧談齊邦媛《巨流河》。

徵引書目

一、近人論著

(一) 專書

- 王集叢：《戰鬥文藝論》（臺北：文壇社出版，1955年）。
- 王丹：《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十五講》（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年）。
- 王智明、林麗雲、徐秀慧、任佑卿編：《回望現實·凝視人間——鄉土文學論戰四十年選集》（臺北：聯合文學，2018年）。
- 王惠珍：《譯者再現：台灣作家在東亞跨語越境的翻譯實踐》（新北：聯經出版公司，2020年）。
- 尹雪曼：《五四時代的小說作家和作品》（臺北：成文出版社，1980年）。
- 尹雪曼總編輯、周錦主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臺北：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印行，1980年）。
- 古遠清：《幾度飄零：大陸赴臺文人沉浮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
- 李怡、毛迅主編：《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第16輯（成都：巴蜀書社，2015年8月）。
- 李怡、毛迅主編：《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第17輯（成都：巴蜀書社，2015年11月）。
- 李建平、張中良主編：《抗戰文化研究》第10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
- 杜國清、羅德仁主編：《臺灣文學英譯叢刊No.37：臺灣皇民文學專輯》（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年）。
- 周錦：《論「呼蘭河傳」》（臺北：成文出版社，1980年）。
- 林海音編：《中國近代作家與作品》（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80年）。
- 封德屏主編：《台灣人文出版社30家》（臺北：文訊雜誌社，2008年）。
- 孫康宜主編：《劍橋中國文學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7年）。
- 張泉中譯：《被冷落的繆斯：中國淪陷區文學史（1937-1945）》（北京：新星出

版社，2006年）。

張中良：《抗戰文學與正面戰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

陳平原編：《文學史的書寫與教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

葉石濤、鍾肇政主編：《光復前臺灣文學全集 1：一桿秤仔》（臺北：遠景出版社，1997年）。

游勝冠：《臺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臺北：群學出版社，2009年）。

程光燁編：《文學史的多重面孔：八十年代文學事件再討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社：《當代文學史料研究叢刊》第2輯（臺北：大呂出版社，1987年）。

趙稀方：《翻譯與新時期話語實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

劉心皇：《抗戰時期淪陷區文學史》（臺北：成文出版社，1980年）。

聯合報編輯部：《寶刀集：光復前臺灣作家作品集》（臺北：聯合報社，1981年）。

謝霜天：《夢迴呼蘭河》（臺北：爾雅出版社，1982年）。

蘇雪林：《二三十年代的作家與作品》（臺北：廣東出版社，1979年）。

蘇雪林等著：《抗戰時期文學回憶錄》（臺北：文訊月刊雜誌社，1987年）。

蘇敏逸：《流浪者之歌：「東北作家」的鄉土敘述與社會記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20年）。

藍海（田仲濟）：《中國抗戰文藝史》（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10年）。

Edward M. Gunn, Jr. *Unwelcome Muse: Chinese Literature in Shanghai and Peking, 1937-1945*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二）期刊論文

不著撰人：〈致讀者〉，《文學雜誌》創刊號（1956年9月），頁70。

王志健：〈談抗戰文藝〉，《文學季刊》第8期（1980年10月），頁7-14。

王鈺婷：〈五四女性文學傳統之傳承與轉化——以台、港《純文學》「近代中國作家與作品」專欄為討論範圍〉，《民國文學與文化研究集刊》第3期（2018年6月），頁120-145。

- 王克文：〈歐美學者對抗戰時期中國淪陷區的研究〉，《歷史研究》第5期（2000年5月），頁170-179。
- 李歐梵：〈三十年代文學的研究：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的二十本書〉，《書評書目》第89期（1980年9月），頁26-32。
- 李仲明：〈抗戰時期淪陷區文學研究述略〉，《抗日戰爭研究》第4期（1998年），頁69-81。
- 李知灝：〈「被嫁接」的臺灣古典詩壇——《中華民國文藝史》中官方古典詩史觀的建構〉，《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5期（2007年10月），頁187-216。
- 宋廣仁：〈抗戰中海明威的訪華行程〉，《文學思潮》第12期（1982年7月），頁79-82。
- 杜國清譯、夏志清：〈端木蕻良的「科爾沁旗草原」——作者生平與作品研究〉，《現代文學》復刊第21期（1983年9月），頁7-53。
- 吳自強：〈新時期文學與「名著重印」——以人民文學出版社八十年代版「現代作家選集叢書」研究為例〉，《文藝爭鳴》第2期（2020年），頁7-14。
- 林瑞明：〈兩種臺灣文學史——臺灣 vs. 中國〉，《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7期（2008年10月），頁107-145。
- 姚一葦：〈編輯前記〉，《現代文學》復刊第21期（1983年9月），頁3-4。
- 張迺瑩：〈曠野的呼喊〉，《現代文學》復刊第21期（1983年9月），頁297-322。
- 張俐璇：〈重返江湖，所為何事？——上官鼎《雁城諜影》的「抗戰」書寫〉，《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27期（2018年10月），頁295-322。
- 張俐璇：〈從問題到研究：中國「三十年代文藝」在臺灣（1966-1987）〉，《成大中文學報》第63期（2018年12月），頁159-189。
- 黃怡菁：〈文學史的書寫形態與權力政治：以《中華民國文藝史》為觀察對象〉，《臺灣學誌》創刊號（2010年4月），頁75-97。
- 黃惠禎：〈郭沫若文學在台灣：其接受過程的歷史考察〉，《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16期（2013年4月），頁215-250。
- 謝詠：〈《中國新文學史稿》的版本變遷〉，《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6期

(2009年)，頁129-136。

蘇偉貞：〈彌補與脫節：臺、港《純文學》比較——以「近代中國作家與作品」專欄為主〉，《成大中文學報》第60期（2018年3月），頁31-64。

(三) 論文集論文

李京珮：〈曲折的縫綴：《純文學》對五四作家的接受〉，收於封德屏總編輯：《台灣現當代文學媒介研究：2007青年文學會議論文集》（臺北：文訊雜誌社，2008年3月），頁77-100。

(四) 學位論文

黃崇軒：《建構本土·迎向群眾——《自立副刊》研究（1977-1987）》（臺中：靜宜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7年7月）。

陳采琪：《跨時代的「皇民文學」作家——陳火泉研究》（新竹：清大台文所碩士論文，2015年1月）。

傅星福：《軍方刊物對民主運動的報導：以《國魂》與《青年戰士報》為例》（臺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

(五) 報紙文章

文船山：〈抗戰時期作家——蕭紅·蕭軍·端木蕻良：他們的愛情與生活底悲劇〉，《聯合報》第八版，1980年6月15日及16日。

不著撰人：〈沒有中華民國文壇參與，算什麼抗戰文學會議〉，《聯合報》第八版（聯合副刊），1980年6月19日。

玄默：〈蕭軍與蕭紅〉，《中央日報》第六版（中央副刊），1966年11月2日。

自聯社：〈淺水灣投蕭紅墓上 魯迅弟子遙祭冤魂〉，《聯合報》第六版（聯合副刊），1955年6月25日。

余雙仁節譯，夏志清：〈端木蕻良的科爾沁旗草原〉，《中國時報》第八版（人間副刊），1980年6月16日。

周錦：〈抗戰文學的整理和創作（下）〉，《中央日報》第十二版（中央副刊），1980年7月8日。

梁錫華：〈出戰孔羅蓀〉，《中國時報》第八版（人間副刊），1980年6月12日。

梁錫華：〈巴黎之會的序曲：貳·豈能「有啥幹啥」？——喚醒酣睡中的抗戰文學資料〉，《中國時報》第八版（人間副刊），1980年6月13日。

梁錫華：〈風暴之眼〉，《中國時報》第八版（人間副刊），1980年6月19日。

彭碧玉、丘彥明整理：〈文學的歷史不容篡奪！——抗戰文學的保衛與整理（上）〉，《聯合報》第十二版（聯合副刊），1979年7月6日。

墨人：〈抗戰文學的整理與再創作（上）〉，《中央日報》第十版，1979年7月25日。

聶崇章：〈巴黎之會談些什麼？〉，《中國時報》第八版（人間副刊），1980年6月20日。

聶崇章：〈巴黎風暴：抗戰文學的檢討及中國文學的展望〉，《中國時報》第八版（人間副刊），1980年6月22日。

(六) 電子資源

黃惠玲主持：〈「藝想世界」紀錄片《如歌的行板》拍攝詩人痲弦的人生〉，網站 (<https://ppt.cc/fnnY9x>)，2014年10月29日發表。（檢索日期：2021年11月10日。）

The Resistance Against Chinese Resistance Literature

——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aiwan (1978-1992)

Chang, Li-Hsuan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Hong Kong publisher Joint Publishing published the book “Duanmu Hongliang” in 1988. The edition found today i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s library still carries stickers reading “special materials/restricted reading,” showing that the prohibition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ad not been lifted following the lifting of martial law. However, in the early 1980s, writers from northeast China such as Duanmu Hongliang appeared one after another in Taiwan’s two major newspapers and in a special edition of Modern Literature on “Chinese resistance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aiwan’s discussion of writers from northeast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martial law was a resistance against research on “Chinese resistance literature.”

Research on resistance literatur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perienced a transition since the country’s reform and opening up. Despite going from “liberated areas” to “occupied areas,” literature from “KMT-dominated areas” also appeared. As a result, following “art and literature from the 1930s,” “literature from the war of

resistance” once again became a topic wher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vied over the right to interpret it.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came to be selectively accepted into Taiwan and, through “the experience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e attempt was made to incorporate “pre-retrocession Taiwan literature” into it. Through this,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within the field of Taiwan literature in the 1980s there existed a resistance against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resistance literatur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at at the same time was also a resistance against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resistance literatur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Keywords: Resistance Literatur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Writers from Northeast China, Pre-retrocession Taiwan Literature, *Jeweled Sword Collection*